

离别集

周亮 周学禹 祝克懿 编著

生离死别，人皆有之；至情臻景，今古相通。

挥手之间，漫折杨柳；心神所系，长亭短亭。阳关

三叠，千年绝唱；桃花潭水，亦纯亦清。海内知己，

天涯比邻；思之悟之，珍重人生。

主编 赵丛仁 白本松

中国古典诗词类编



河南人民出版社

劉別集

劉別集

劉別集

劉別集

劉別集

劉別集

劉別集

劉別集



周亮 周学禹 祝克懿 编著

主编 赵丛仁 白本松

离别集

河南人民出版社

中国古典诗词类编

离 别 集

周 亮 祝克懿 周学禹 编注 责任编辑 周 人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郑州市农业路73号)

焦作市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960 1/32 印张11.25 字数 183000

1993年1月第1版 1993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910

ISBN7-215-01980-2/I·196 定价5.45元

引 言

(一)

在我国古代诗词中，描写离别之作的作品不仅数量大，而且杰作多，成就显著，深为 人 民 所 喜 爱。究其原因，主要是这类作品中表现了人性这个人类共同的永恒主题，展示了人情美。一个完美的社会包括高度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两个方面，仅有物质上的享受是不够的。如果人类没有爱、仁慈、关心、理解和同情这些重要的感情，即使我们有良好的身体，舒适的家庭，富裕的生活，生命却是空虚的。我们需要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人与人之间的互助互爱，以及相互尊重和信任。那些人际间的勾心斗角，欺骗和倾轧，剥削和压迫，嫉妒和谗毁，多疑和冷酷，无疑会使我们丧失做人的本质。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真善美的事物毕竟是占主导地位的，它必定要战胜假丑恶的东西，人类社会总是在不断地完善中前进的。我们编写的这本《离别集》

正是通过历史的再现来证明这一客观规律。“情本性生，性由情显。”书中的作品通过描写最能表现人物性情的离别之事，揭示了美好的人性。我们可以看到亲人间那种难分难舍的骨肉情意；夫妻间的婉婉恩爱；情人间的缠绵绸缪的恋情；朋友间推心置腹、肝胆相照的真挚友谊。这一首首洋溢着浓郁人情味的离别之作，使人们能够相互了解，感情加深，关系融洽，这表明人情美“是人类一种积极的力量，是一种将隔离人与人之间的大墙摧毁的力量，也是一种把人与人结合在一起的力量，它使人克服寂寞和孤独感”。（埃·弗罗姆《爱的艺术》）总之，这类作品有利于社会的发展，把人与人连结起来了，教我们去如何尊重人、热爱人，使人道主义的阳光照耀着我们这个世界，让我们感受到人情的温暖，驱散阴霾，鼓舞着我们大胆地投入社会生活，热爱生活，去建立一个更加文明的社会。这是我们编写此书的主要意图。

其次，“人类从野蛮到文明，靠文化进步。从生物的人到社会的人，靠文化教化。人们千差万别的个性、气质、情操、风格，靠文化培养。人们的欢乐与痛苦、高兴与悲伤、幸福与不幸以及崇高与卑俗、伟大与渺小诸如此类的情感，靠文化赋予”。（司马云杰《文化社会学》）《毛诗序》也曾指出，诗歌可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

化，移风俗”。由此可知，文学作品具有陶冶性情、提高艺术修养的作用。正因如此，我们在阅读此书时，可以领略到古人们淳朴的精神风貌和高尚的品质。我们常常随着各种离别场面的描写而神游，似乎身临其境，耳有所闻，目有所见，与之共命运，同忧乐。它与我们曾有过类似的经历沟通了，那些埋藏在我们心底的感情被呼唤出来。我们欣赏这些优美的作品，好象正品尝着古人为我们酿造的琼浆，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真善美的东西和巨大的艺术感染力使我们陶醉，感情得到升华。由此得知，古代的离别之作在今天仍有旺盛的生命力，它在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培养人们的审美情趣和高尚情操方面，仍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另外，对我们来说，这类离别之作还有很强的社会实用价值，当人们遇见离别之事时，它能助你一臂之力，你可以从中选取与自己心境相符的作品或句子来赠亲送友，这样既恰如其分地抒发了情感，又使自己的言语或书信显得有分量和有文采。

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指出，评价优秀作品应根据两个原则：一是看其主题是否具有普遍性和永久性；一是看作品是否有益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古代离别之作则完全具备了这两个方面。它们不仅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状况和人们的精神面貌，表现了人情之美这一永恒的主题，使人喜闻乐

见，而且具有美学价值，并对人类社会的完善起到积极作用。对于这份珍贵的古代文学遗产，我们应当继承下来，吸其精华，让它们在繁荣文学艺术、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改造社会、美化心灵等方面起到应有的作用。列宁说得好：“马克思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列宁选集》第四卷）

（二）

人情 素在社会关系和家庭生活方面显得十分重要，甚至我们的理性思考与道德判断都被感情化了。它已积淀为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心理的深层结构。文学作品作为一种社会生活现象，它是民族心灵的对应物，是民族性格特征的物态化和结晶体。“越是伟大的艺术家，越是把他本民族的气质表现得深刻”。（丹纳《艺术哲学》）离别之作从一个生活侧面表现出我们民族的气质和性格。这些洋溢着人情美的作品，正是中华民族美德的真实写照。对于这种民族心理结构的形成，可以用法国启蒙学家们“环境决定人性”的观点来解释。

首先，我们来探讨一下形成这种人情文化的社

会自然环境。

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几千年古老文明史的民族。人们长期生活在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中，商品经济不发达，自足自给，所以人口的流动性不大，生活具有很强的稳定性。人们一向安土重迁，不肯轻易地离开氏族和故土。在此经济基础上，他们增进了解，彼此间的感情也日益加深，“建立友好、同情、和爱的精神所表现出来亲近和依恋的特殊关系”。（安德烈耶娃《社会心理学》）他们聚族而居，血缘关系密切，邻里之间日益熟悉和友好，互帮互助，相互关心和同情，古道热肠，使人际交往中的感情色彩加重。在这种环境中产生了集体无意识，对外表现为社群性，导致个人只能在人群中安身，很少越出其外，人们的家庭观念和乡土观念强。如孔子曾说道：“父母在，不远游。”（《论语》）荀子也说：“人之生，不能无群。”（《富国篇》）由于这种文化传统的影响，便出现了“唯世间兮重别”（江淹《别赋》）的现象。一旦要分别，双方都依依不舍，有的“远送于野……泣涕如雨”；（《诗经·邶风》）有的“悲与亲友别，气结不能言”；（《古诗十九首》）有的“劝君更饮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王维《送元二使安西》）有的“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有的“执手相看

泪眼，竟无语凝咽”；（柳永《雨霖铃》）有的“辞君且作随阳鸟，海内无家何处归”。（张偁《辞房相公》）在小农经济的社会环境中，人情文化得到了充分的培养和发展，而不象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那样，“人与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共产党宣言》）中华民族在人情文化的熏陶中，形成了以“人情”作为处世标准的思维模式和心理深层结构，尽管经过数千年的历史变迁，而这种文化传统仍被保留下来，植根于人们的心中，左右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促使大量弥漫人情味的离别之作纷纷出现。

其次，人情文化的形成与文化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二千多年来，儒家思想在中国一直占着统治地位，成为正统。其思想核心是“仁”，这种仁就是以亲子之爱为核心，扩展为对外人道主义和对内的理想人格。儒家强调人的社会性和交往性，强调“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强调人际关系的和谐亲睦，互爱互助，宣扬温情脉脉的人道主义。孟子主张“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孟子·滕文公上》）“无恻隐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孙丑上》）这种思想又经过后世的儒家卫道士的继

承和发扬光大，在社会上蔓延开来，形成了一种文化环境，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如果说社会自然环境是形成中国人情文化的内在因素，那么文化环境就是它的外在因素。它为人情文化的产生提供了外在条件，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由于以上的主要原因，人情文化在中国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显示出持久性和相对独立性，并直接或间接地、自觉或不自觉地影响和支配我们。它象一个巨大的磁铁，将一切事物都吸引过来，聚附在自己的周围。文学作为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也必然反映出这一特征。在那生离死别的特定环境中，人们的情感更是充分地表现出来，而诗歌这一文学样式便成为他们抒情的最好工具。钟嵘说：“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嫖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反……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诗品序》）然而也有少数人对此则不以为然，沈德潜就曾说：“若小小送别，而动欲沾巾，聊作旅人，而便云万里。”（《说诗晬语》）沈氏似乎认为人们写这类作品是小题大作，夸张感情，虚伪的成份太多。如果这一批评是针对某些低劣的离别之作来讲的，那么倒还合适，假若是对准大多数的，则是失之不察了。其

错误就在于沈氏忽视了离别作品得以产生的人情文化传统的存在，孤立地来看待这一文学现象，而不是将它放在大的社会环境里来考察，所以得出了这一片面、武断的结论。其实这种重视情感的文化传统至今仍为少数民族所保留，他们的重视程度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毋庸置疑，人情文化在社会发展上起到了积极作用，它不仅使人感觉到了人情的温暖，保持和享受着心理的快乐，而且也为我们带来了许多具有审美价值的优秀作品。

(三)

社会生活是纷繁复杂的，它反映在文学作品中就表现为丰富多样性。江淹指出“别虽一绪，事乃万族”。（《别赋》）他看到了离别之事的多样性。在我们阅读这类作品之后就会感到，要给它们归纳分类并非是一件易事。因为一首作品往往包含着多种因素，具有多方位性。如按人际关系上来分：有亲人之别、夫妻之别、朋友之别、同学之别、同乡之别、情人之别等等。按离别的缘由来分：有行役之别、仕途失意或遭贬之别、生死诀别、亡国被俘之别、为国赴难之别等等。按离别的场面来分：有喜别、悲别、壮别、怒别、伤别等等。我们根据避繁求简的原则，将它们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描写爱情生活

马克思说：“爱情第一次真正教人相信自己身外的实物世界，它不仅把人变成对象，甚至把对象变成人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4页）真正的爱情是将心换心，以爱换爱，是一种男女之间除了相互爱慕之外，就再无其他动机的人性审美关系，是在人性美基础上的异性相吸。我们这个民族在爱情生活上专一和坚贞的，正所谓“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汤显祖《牡丹亭·题辞》）人们也很善长描绘爱情方面的生离死别，悲欢离合，展现美好的心灵，叙述美丽、动人的故事。如曹丕的“慊慊思归恋故乡，君何淹留寄他方？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燕歌行》）崔颢的“垓上流泉垓下分，断肠呜咽不堪闻。嫦娥一入月中去，巫峡千秋空白云”。（《别佳人》）李商隐的“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无题》）杜牧的“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赠别》）欧阳修的“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踏莎行》）晏几道的“渐写到别来，此情深处，红笺为无色”。（《忆远人》）柳永的“多情自古伤离别，更哪堪冷落清秋节”。（《雨霖铃》）秦观的“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

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鹊桥仙》）关汉卿的“手执着饯行杯，眼阁着别离泪”。（《别情》）一首流行于明代的民歌唱道：“要分离，除非天做了地！要分离，除非东做了西！要分离，除非官做了吏……就是死在黄泉，也做不得分离鬼！”另一首清代民歌唱道：“离别时哭哭啼啼，一把手儿扯住亲人衣，看冤家舍不得你，再三再四留不住你。”培根说：“人的天性在私生活里最容易看出，因为在那种生活里是没有虚饰的。”（《文艺复兴到19世纪资产阶级哲学系思想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言论选辑》）这些作品是作者最真实、最诚挚的感情的自然流露，表现出男女双方在分离时的痛苦，久别后的刻骨相思。其中，有的是缠绵悱恻，红泪沾巾，哀婉低沉，含情脉脉，可谓千种姿态，万般柔情；有的是敢恨敢爱，敢说敢做，大胆泼辣，毫不掩饰自己的内心情感，勇敢地去追求爱情生活并极力地去维护它。无论是欢乐还是痛苦，无论是含蓄温存还是豪爽粗犷，它们都是人性的真实展现，是在人性美的土壤里生长起来的绚丽花朵，让人体会到人性的审美价值，领略到那些高尚、温馨、纯洁、美好的情操。

朱光潜先生曾评价道：“中国爱情诗大半写于婚嫁之后，所以最佳者往往是惜别悼亡。”（《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这种观点虽然带有个人的

主观色彩，但也反映出夫妻离别诗文中确有不少的优秀作品。这类作品写得情深意浓，声情并茂，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如《孔雀东南飞》中对刘兰芝离别婆家时的一段描写尤为精彩，其中共有三个告别的场面：先是兰芝与婆婆的辞别，虽然焦母强行拆散了她与焦仲卿的婚姻，毁坏了他们的幸福生活，但兰芝生性忠厚善良仍来辞行，并孝顺地说：“今日还家去，念母劳家里。”然后又与小姑别，抚今追昔，念及友情，不由得“泪落连珠子”。沈德潜阅之，大为感慨，赞叹道：“别小姑一段，悲怆之中，自足温厚。”（《说诗晬语》）最后，当她与丈夫焦仲卿告别时，则是出于夫妻间的恩爱之情，她渴望得到幸福，希望与丈夫永不分离，于是信誓旦旦地说：“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蒲苇纫如丝，磐石无转移。”分手之际，“举手长劳劳，二情同依依”。通过告别的场面描写，刻画一个温柔敦厚、通情达理的妇女形象，展现出东方女性特有的美德，它曾扣动过多少人的心弦，陶冶过多少人，使多少人的情感得到升华。此类佳作还有陆游的《钗头凤》，词中写尽了作者与妻子唐婉离别后的相思之情。他们被迫分手后仍然深深地相爱着，爱得是那么坚贞，并不因各有家室而改变初衷，反而思念倍增，“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因相思而消瘦，因相思而以泪洗面，进而伤

叹“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诚可谓“天长地久有尽时，此恨绵绵无绝期”。它也向读者表明：真正的爱情是扼杀不了的，它是以无私的赤诚相爱为前提的，这种爱是强烈持久的，这就是人性的可贵之处，人性的光辉是遮不住的，它最终要洒遍人间。《西厢记》中的《长亭送别》一折深受广大人民的喜爱，达到了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程度。莺莺和张生的爱慕之情在送别时刻得到充分的表露，他们情真意切，眷恋不舍，连周围的景物也为之动情：“碧云天，黄叶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由此可见，爱情是神圣的，美好的，它是多么了不起，可动天地，撼鬼神，遂令后世，无情者心动，有情者肠裂。作品本身越具有审美价值，其艺术形象就越能打动读者的感情。诸如此类的杰作还有苏武的《留别妻诗》，李白的《别内赴征》，杜甫的《月夜》、《新婚别》，晁采的《春日送夫之长安》，戴叔伦的《新别离》，陈玉兰的《寄夫》，贺铸的《鹧鸪天》，孔平仲的《寄内》，李清照的《凤凰台上忆吹箫》、《行香子》，刘绩的《征夫词》，屈安人的《送夫入觐》等等，你在本书中可一睹它们的风采。

描写骨肉之情

中国的仁爱是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是以亲子之爱为核心，扩展为对外的人道主义的。孟子

说：“亲亲、仁也”，（《孟子·尽心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与其他人际关系相比，亲人之间的感情“是所有情感的结合中最神圣的结合”。

（弗罗姆《爱的艺术》）所以当家庭中的任何一员要离家外出之际，大家都慈爱难割，骨肉难分，正如江淹描写的那样，“攀桃李兮不忍别，送爱子兮沾罗裙”。（《别赋》）骨肉之情是最为纯真的，它不掺杂一星半点的虚假成分，它是人的天性的本能流露，是为各民族、各阶级所共同拥有的，鲁迅曾指出：“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答客诮》）这种纯洁无暇的骨肉之情散发着人性美和人情美的馨香，当我们一经嗅之，便深深地陶醉其中了。

《诗经·邶风》是卫定姜为出嫁的妹妹送行时所作的，诗中写道：“之子于归，远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姊妹间的深厚友情溢于言外。白居易为入蜀的弟弟送行时反复叮咛：“岂是远行时，火云烧栈热。何言巾上泪，乃是肠中血。念此早归来，莫作经年别。”（《别行简》）诗中的殷切话语体现出作者对同胞兄弟的关心和爱护。苏轼与弟子由分别多年，思情绵绵，为手足分离而感慨万端，仰天问月：“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